

周恩来与连环画

——抗战时期把“小人书”作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 李兴瀛

“小人书”是对装订成册连环画的通俗叫法。因为书很小，64开，30页，图画中的人物也很小，人物形象又具漫画风格，图文并茂，简明易懂，很接地气，所以人们亲切地称连环画册为“小人书”。

抗战时期的小人书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周恩来认真实践了毛泽东这一文艺方针，把连环画当作革命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夏天，日寇占领南京、徐州等地后，分水陆两路疯狂扑向武汉三镇，骄横气焰不可一世。此时武汉地区聚集着许多来自京、沪、平、津、鄂、豫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和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强烈希望以文艺作为揭露敌人和打击敌人的武器，为保卫大武汉和全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其时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三厅集中了冯乃超、阳翰笙、胡愈之、何成湘、潘念之、田汉、洪深、洗星海、徐悲鸿、张曙等著名的文艺进步人士，人才济济。周恩来衡量了当时的内外形势，把在武汉和河南各地分散活动的一些演剧队和歌咏队，合编成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隶属于政治部三厅。有了“政治部第三厅”这块招牌，就可以“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画我们的画”了。

周恩来在三厅内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和领导干部党小组。三厅领导的抗日漫画宣传队汇集了当时国内一流的连环画画家、漫画家，如叶浅予、张乐平、胡考、梁白波、廖冰兄、张仃等。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举办的连环画展影响巨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

的《论持久战》的精神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号召全体队员们“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为抗日战士和广大人民服务”。广大宣传队队员积极响应号召，在“保卫大武汉宣传周”期间，漫画宣传队举办了“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1938年10月，廖冰兄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图》，在安徽、浙江、江西、广西各城镇流动展出。1939年，《抗战必胜连环图》由桂林文化供应出版社出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创办的《抗战漫画》（半月刊）在武汉出版了12期，武汉失守后又在重庆出版刊登了大量的连环画作品，记录了投身抗日救亡的连环画战士们的斗争业绩。

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队长叶浅予当时是全国抗日漫画、连环画活动的指挥员，领导了抗日漫画、连环画活动在全国的开展。1939年，叶浅予赴香港筹办《今日中国》杂志。1940年，叶浅予和妻子戴爱莲从香港回重庆，准备奔赴延安。周恩来诚恳地挽留说：“延安固然需要你们这样的文化人，但大后方同样也很需要。我希望你们能留在重庆搞好抗战的文化宣传，效果也许会更好。”经周恩来的劝说，叶浅予夫妇留在了重庆，继续领导抗日漫画、连环画工作。

1945年，张文元等人举办了“八人漫画展”，展出的连环漫画包括《战时重庆》《逃出香港》等。周恩来亲自到会场观看展览，并会见叶浅予等人，高度称赞了画展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制订了一个“国际任务交流计划”，邀请知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到美国参观访问。美国政府从重庆文艺界邀请了作家老舍、戏剧家曹禺、连环画画家叶浅予和夫人戴爱莲。1946年9月，叶浅予夫妇前往美国，启程前周恩来夫妇亲自为他们送行。

鼓励支持国统区的连环画画家

周恩来十分关心国统区连环画画家的创作，鼓励他们以画笔为武器，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投入到抗战斗争中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创作了大量作品，发挥了连环画鼓舞斗志，揭露敌人的作用。叶浅予代表作《王先生》是连载时间最长的连环画，先后连载历时10

年。张乐平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是影响最大的连环画，“三毛”这一艺术形象一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并影响至今。梁白波是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唯一的女队员，也是抗战时期唯一的女连环画画家，在中国漫画界，她有“第一才女”之称，其代表作为连环画《蜜蜂小姐》。

1945年11月，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接见宴请漫画家余所亚以及《木刻联展》作者王琦、王树艺、梁永泰、丁正献、刃锋、刘岷等。周恩来号召木刻家要把木刻运动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工厂，并建议“多创作一些连环木刻画，因为连环画是最易为广大工农群众所理解、所接受的形式”。

周恩来还建议把《木刻联展》的全部作品送往延安展出。1946年9月，王琦等木刻连环画画家在上海举办“八年抗战木刻展”，参展的漫画、连环画作品达1000多幅，规模空前。周恩来在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离前夕，仍然惦记着连环画画家，在中共驻沪办事处接见了王琦、丁聪、沈同衡、张文元等人，亲切地询问他们家的生活情况，给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连环画画家巨大的鼓舞。

宣传推介延安“鲁艺”木刻连环画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是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一大批热血青年冲破艰难险阻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熔炉。与此同时，一批追求光明的文艺青年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于是鲁迅艺术学院

应运而生。

延安鲁艺的师生及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原则，沉下身心，投身到火热的抗战之中。他们深入农村、工厂、前线，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同时向民间艺术家学习，探索美术创作的新形式，从而产生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秀美术作品。周恩来把延安的一些木刻连环画作品介绍到战时陪都重庆展出，向重庆的参观者详细介绍了力群的木刻连环画《小姑娘·刘保堂》，蔡若虹的连环画《没有土地的人们》《苦从何来》《心里的疙瘩解开了》等三套组画，彦涵的16幅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等。

周恩来来说，延安鲁艺的木刻连环画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大众化。连环画的受众是工农兵和人民群众，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要让人民群众能够接受。其二是民族化。在延安时期的“鲁艺”创作中，作品以木刻连环画居多。在木刻的手法上，艺术家们借鉴了外国的木刻作品中黑白对比的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的阳刻造型融入作品之中，刀法豪放而又朴实，画面层次分明，明快易懂，人物性格特征突出，紧扣主题，使之不仅具有木刻的“力之美”，且充满了乡土气息和浓厚的民族特色。

周恩来带去的延安木刻作品，犹如一股崭新的清风吹入“雾都”重庆，让国统区的民众看到了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令重庆连环画画家看到了延安战友的新作，促进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木刻连环画画家的交流。

（摘编自《文史精华》原创版2016年第10期）



廖冰兄：《抗战必胜连环图》

与曹操、刘备基本上属于白手起家不同，孙权是从哥哥孙策那里获得江东权柄的。就在曹操击败刘备、俘其妻小、捉住关羽的那一年，公元200年，声震江东的孙策遇刺身亡，时年26岁。年仅18岁的孙权临危受命，执掌江东。同时，孙策为孙权留下的，还有吕范、张昭、周瑜、鲁肃等一批能臣武将。

当时的形势是，江东偏远山区还未控制，而流寓之士，“皆以安屯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这于孙权而言，是很不利的。但张昭、周瑜等人觉得孙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服事焉”，这于孙权又是有利的一面。

民众归心，贤能归用

当时，曹操听闻孙策死讯，便欲乘表而伐，后听侍御史张纮的建议，上表荐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郡太守。同时推荐张纮担任会稽郡东部都尉，曹操的用意是让他辅佐孙权，以功导孙权归附朝廷。而吴夫人认为孙权年轻，便委托张纮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孙权派张纮去会稽郡赴任，有人认为他是朝廷任命的官员，恐怕他的志向不仅仅此如此，但孙权并不因此而介意。这表明，孙权心中有城府幅略，并非不能容事容物的庸主。

其时，鲁肃想要回北方故乡。周瑜便向孙权力荐：鲁肃才干出众，应当委以重任，还要多延聘一些他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大业。的确，这种人才变动时机，也正是雄主用人之契机。于是孙权立即接见鲁肃，大为赏识，并问有什么办法能助他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鲁肃分析形势后说，保守江东，以观察天下大局的变化。如果能乘曹操北方用兵，无暇南顾之机，消灭黄祖，进讨刘表，把长江流域全部控制，就能建立帝王之业。可以说，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于孙权非常适用。孙权当时的答复是，只想治理好本地区，你所说的还没有想到。确实，孙权只想守成，不想开拓，其为雄主，确乎稍逊风骚。而此时，张昭诽谤鲁肃年轻粗鲁，但孙权却更加重视鲁肃。

公元202年，曹操要求孙权派自己的弟弟或儿子到朝廷来做官。孙权召集主要官员商议，张昭、泰松等人犹豫不决，孙权把周瑜领到吴夫人跟前作最后决定。周瑜说：送人质后，就会受制于人。如果征召入朝，不过被封为侯爵，怎么能与南面称孤相比？不如不送人质，从容观察事态变化。如果曹操真能以君臣大义来治理天下，你再侍奉他不晚。如果他图谋不轨，犯上作乱，他连自己都不保，又怎么能害人？这一番话，确为至理，足见周瑜的大智。吴夫人因此对孙权说，周瑜说得很好，“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周瑜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这种同心同德又才干

知人善用 守业有成

孙权用人史话

□ 陈家兴

出众是关键要素。

“将军擒操，宜在今日”

公元208年，荆州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孙权在打荆州的主意，刘备当然也想，只是暂时不能，而曹操更是大张旗鼓而来，要南征刘表。刘表去世，刘琮继任荆州牧，便以荆州降曹。以致刘备仓皇出逃，在当阳长坂被曹操追上，抛妻弃子才和其他人骑马逃走。也正是在长坂，孙权派鲁肃与刘备相见，开启了孙、刘联盟抗曹的大势。孙权能听鲁肃良言而与刘备联盟，是雄主胸襟气度决定的。

当时，曹操写信给孙权，说统领军80万，要与孙权“会猎于吴”。长史张昭等人的意见是迎接曹操、投降朝廷。周瑜则认为：“将军擒操，宜在今日。”显然，少壮派的力量已经形成，也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孙权能倚重少壮派的力量，更终能成事，与其对年轻人才的擢拔重用是分不开的。正是有诸葛亮、周瑜、鲁肃等众贤之智与力，才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使赤壁一战锁定三分天下之大局。

上巳节上演的授权仪式

——兰亭雅会之外的故事

（上接1版）

再次，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是全体中华儿女坚定不移、代代相传的信念。我们曾经辉煌，也曾经衰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既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21世纪中国的突出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最后，中国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梦与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梦想相一致，是开放、包容、共享的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梦的国际表达。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要发展中国、稳定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党的十八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即实现中国梦的总体布局是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而为完成这五个方面的宏伟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具备强大的物质基础，也要求我们具备强大的精神力量。诸多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没有牢固的精神框架做支撑，没有人民精神上的团结以及道德准则的一致，所有一切美好的设想就只能停留在口号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但它必须与时代融合才能为现时代的人们所接受。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紧密结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中国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唯有人民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之源。实现中国梦，需要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需要充分发挥全体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追梦需要勇气，圆梦需要行动。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既要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蹚过深水区去追梦，也要诚实劳动、开拓创新，以实干兴邦，以实干圆梦。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 郑易旭

兰亭位于浙江省西南的兰渚山，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了兰亭集会，邀请了40余人临流赋诗唱和，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一文，“被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一种“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褻事也。”即指此事，又作“褻除”，最初是暮春三月上旬的巳日，在魏朝以后，定为农历三月三日，人们相聚在水边洗去污垢不祥之物，用来祈福。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举办兰亭雅集之后，写的一篇记录此次雅集的序文。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组织者王羲之与孙绰、谢安等名流在山阴兰亭“修褻”，这次雅集可不仅仅是去除污秽这么简单，读《兰亭集序》一文可知，大家聚在一起“流觞曲水”“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以“畅叙幽情”，真是文人的盛会、真正的雅集。这篇序文的前两段写此次雅集具体情况，主要就是饮酒赋诗，所谓“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在第二段中，以“信可乐也”一语作结。后面两段紧接“信可乐也”而来，笔下一转，作者着力抒发人生的感慨，时光短暂，盛世不常，这种乐事又能有多少呢？生命之长短并不是主观想法能决定的，而全凭自然之造化，其中的“痛”就是“死生亦大矣”，但是“一死一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生死等同的说法又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更是妄造的，批评了崇尚老庄，不务实际，大谈玄理的风气，重点关注了人的生命价值。

我们现在还在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却忘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上巳节。古时候，上巳节的名气可一点不比其他节日差，在汉代就被确定为节日了，它起源于“褻褻”这个习俗，若翻检汉代以前史籍资料，能经常看见“褻”这个词，更说明这个习俗在很久远的年代已经为人重视。有一则出自《论语》的典故“浴乎沂”，指暮春时在沂水中盥洗手足、衣物，而不是洗澡，这便是“褻褻”之俗了。

到了魏晋时期，上巳节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一日，不再仅仅是“修褻事也”，而文人聚会，流觞赋诗，帝王宴请等活动也加入其中。究其原因，一方面，这的确是与人们思想转变有关；另一方面，这主要是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正始年间，即魏齐帝曹芳在位时，由于国内政治多不稳定的因素，许多士大夫遭迫害致死，一部分人投向林泉之中，这时期“竹林七贤”就是代表，而始于三国魏时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的清谈之风，到了东晋也愈演愈烈。所谓“清谈”亦称玄谈，指的就是魏晋时期一种重口才、辩说，崇尚老庄，空谈玄

理的风气，甚至统治者也加入其中，并乐此不疲。上巳节褻褻正好给士大夫们提供了一次聚在一起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一起清谈、品评人物、赋诗咏怀，极尽风雅之能事。据史料记载，在东汉时期上巳节时就有分流行觞的习俗，魏晋时统治者附庸风雅，往往也与民同乐，而兰亭雅会确实开文人在上巳节大规模聚集清谈赋诗之光，这次雅会非常成功，得到了大家的赞赏，而且王氏之地位又重新得到了认可。

琅琊王氏是东晋有名的门阀士族，在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曹魏、西晋时琅琊王氏就开始蓬勃发展，并具有一定影响。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主人公王祥，他的继母王氏生病时想要吃鱼，而这时正是冬天，河面上都结了冰，王祥竟脱了衣服想把冰刮开取鱼。于是给琅琊王氏留下了纯孝的声名。古人常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其实未必如此。王氏家族世居山东临沂，西晋末年，石勒、刘曜等人攻破洛阳，掳走晋怀帝和羊皇后。西晋士族王室举家南迁，最终于建康（今南京市）定居，建立东晋。东晋王朝第一个皇帝是晋元帝司马睿，实际上他并没有实权，朝政大权掌握在王导、王敦兄弟手中，王导总揽朝政，负责发号施令，王敦则驻兵上游，随时可以挥师东下建康，这种士族门阀压制皇权现象在其他朝代并不常见，出现在东晋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因素的，这种

现象也被人戏称为“王与马共天下”，“王”指的就是王氏一族，“马”指的是司马皇室。

据《晋书》中记载，在司马睿与王导等人初入江东时，江东一些贵族本居“天潢帝远”之地，根本没把司马睿放在眼里，王导清楚当下形势，告诉王敦说：“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匡济者。”意思是司马睿虽然具有很高的仁德，但却没有什么名望，王敦威风已振，这时候应该帮帮司马睿。于是他们二人就想出了一个计策，在三月三日上巳这天，让皇帝观“褻褻”之俗。当天，司马睿乘着轿子，威风凛凛，王导、王敦带着侍卫左右陪同，这一招的确震住了吴人望族，他们相率拜于道路左侧，王氏家族也就靠着这个办法树立了司马睿在吴人心中的地位，为东晋王朝在江南发展打下了基础。

巧合的是，王导、王敦等人利用上巳节组织观褻收服吴人，王氏家族的后人代表王羲之也利用上巳节组织兰亭雅集，王羲之时王氏家族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因此兰亭雅集绝不仅仅是聚会喝酒这么简单，单看王羲之请的人和营造的阵势，他更想证明王氏家族并未衰颓，以此走出扭转局势的第一步。